

焦竑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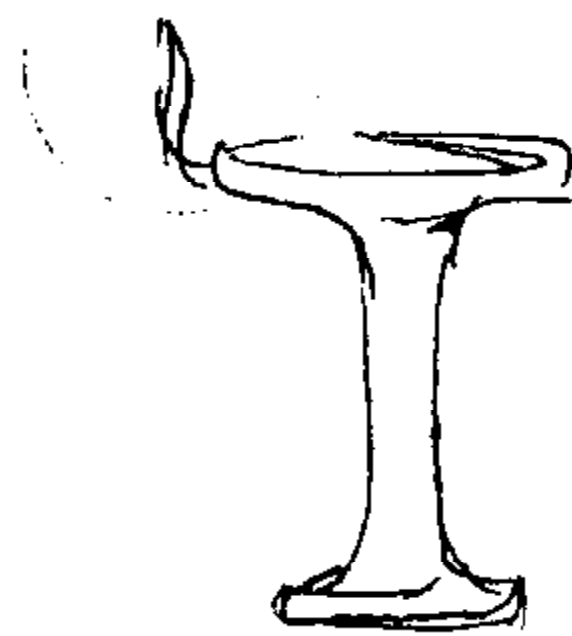
李剑雄 著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焦竑评传

李剑雄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竑评传/李剑雄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74-8

I. 焦… II. 李… III. 焦竑(1540~1620)—评传
IV. B248.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838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焦竑评传

李剑雄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24.5 字数 275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74-8

定价:50.00 元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王 湛 陈万年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巩本栋	时惠荣	张永桃
陈 振	茅家琦	林德宏	周勋初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 亚 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



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



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



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焦竑与《焦竑评传》

何满子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论述王阳明心学形成的道路时，谓“其学凡三变始得其门”。这三变是由泛涉词章而“遍读考亭之书”，但从程朱之学“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久之”；最后，“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终于造就了“心即理”的“致良知”的信念。这个结论是根据王阳明一生治学的实际得出的。

但如果稍稍考察一下中晚明较活跃、较有成就的学者文人，不管是否王阳明心学的景从者，几乎都有类似的历程：因王朝功令和考试进身之需而读程朱所阐释的孔孟之书，不同时期都浸染佛、老二氏之书，最后形成有个性的独立识见。而师从王学的学者文人，则更其如此，焦竑亦不例外。不过到了晚明，由于利玛窦等一批西方学者的到来，较开明的人士又不同程度地接触了泰西之学，学术内容更为多元，焦竑也若干地涉及了西方学术，这是在他的著作中有所显示的。

焦竑以学者立身而非文士，于艺文之事表见不多，他的诗文也是传统诗的继续，似乎无甚突出。焦氏师事耿天台与罗近

溪,又和李卓吾极为心契。罗汝芳是心学泰州学派宗主王艮的再传弟子,其学近禅,今日论学者称王艮一派为“王学左派”;耿定向虽然后来与李贽交恶,但禅悦思想也很浓厚;李贽则不仅尖锐地反对程朱理学,后来简直是崇释“侮圣”而削发了。焦竑的师承和交游,当然使他蒙有影响,以至“时颇以禅学讥之”^①。其实,这种时评是不公正的。从他的著述来看,他是一个兼容并蓄、不拘故常的当时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焦竑的人生见解和人文意识皆对晚明的思想解放过程起过推动作用。现代的文学史家都认为,他和李贽一样,是冲破前后七子僵化保守的公安派的先驱。现代的思想史家也认为,他的出自王阳明心学而力避空疏、趋于讲求务实的学术倾向又是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大思想家经世致用之学的前奏。他治学所涉及的方面之广,著作门类和卷帙之多,并世可比者恐也不多,他是百科全书似的人物。

焦氏治学的宗向可于他所景从的前辈中看出根柢。于近古则钦佩苏辙,于当代学人则心仪杨慎。这两人都是博涉该通的先贤,他治学的方法决定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②。他融会各种学术思想而不陷于偏执,但他终究仍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支柱儒家思想统摄各种学说的。从他的《管东溟墓志》中所说的“冀以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收掇二氏”^③一语,可看出其学问宗旨及治学成果。这里,“西来之意”虽只指天竺释教文化,但引申为他晚期曾接触泰西之学,也未

① 《明史》本传。

② 《明史》本传。

③ 《澹园集》续集卷十四。



尝不可。这方面,他当然没有他的门生徐光启步子跨得大,但以其倾向,他是能大度容纳新知的有卓见的学者。

对这样一位方面极广、成就极高而对晚明文化有极大影响的学者,今人研究者却极少;至少比起与他同时在文化学术史上比肩的李贽、三袁等人物来,他要被冷落得多。他的著作很少重印,据我所知,似乎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焦氏笔乘》的标点本,他的文集《澹园集》整理本虽已在中华书局付梓,至今尚未见书,连当年广传的可作启蒙用的字书《俗书刊误》,现在也不易多见。记得我幼年时,业师就是把这本书当作文字学的基本教材用的。我自己的一点有限的小学知识就是靠此书启的蒙,其勘俗正误之功,至今仍觉很受用。可见焦氏学问的务实的一面竟能惠及童蒙,这在古代大学人中也是很少有的。

这回欣喜地读到李剑雄兄的《焦竑评传》原稿,全书以精练的语言概述了焦氏的生平、治学路数及其成就,用翔实材料支持其纲目鲜明的评述,使读者可从此书大致把握焦氏的造诣和学术地位,是迄今比较完备的一本论述焦氏的学术评传,对于研究中晚明的文化现象,也是一本很有用的著作。焦氏对经学、史学、金石文字之学、考据和文献目录之学有多方面的成就,可阐发和总结其治学经验之处尚多,作为专题性的研究,尚有极大的开拓余地,以焦竑的成就为专案和明代学术的总体贯通,上溯焦竑治学的渊源和后来的学术影响,也还有文章可做,而这些都对清理中国文化、辨明学术变易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部《焦竑评传》的基础上,作者还可驾轻就熟,再作开掘,撰述视界更宽、切入更深的著作,不知作者许可此议否?



内 容 简 介

焦竑是明代后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与文章家。他祖述阳明心学,反对程朱理学,反对思想僵化,以为学者应该独立思考,持独立见解,扫除古人陈腐旧说,开辟全新的思想境界,“辟取自己胸中一片乾坤”。他支持晚明著名反礼教、反传统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思想家李卓吾。焦竑是明代王学思想革新运动左派学者队伍中的一位杰出的学者、后起之秀。他著作等身,以博学多闻而著称,在文字学、古音学、历史学、文献考据学等等实学研究领域中有显著的成就,在明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有较高的地位。

A Brief Introduction

Jiao Hong is a famous scholar, man of thought and essayis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 is the first to expound Wang Yangming's subjective school against Cheng and Zhu's school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s ideological ossification. He believes that a scholar must hold independent views through independent thinking. He offers support to the famous scholar Li Zhuowu who is against feudal ethics and tradition, full of combatant spiri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Jiao Hong, an outstanding scholar, is a promising talent among the leftist scholars of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Wang Yangming's theory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Renowned for his works and high learning, he has go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philology, ancient phonetics, history and textual criticism. He has held a relatively high position in both the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